



JS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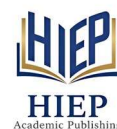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JSSI, Vol. 1, No. 1, 2026, pp.100-109

Print ISSN: 3134-9226; Online ISSN: 3134-9234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ssi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ssi260108scmmp>



语言符号学视角下的儿童道德隐喻研究

孙 荣 (Sun Rong), 刘清源 (Liu Qingyuan), 孙 澳 (Sun Ao)

摘要: 本研究以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为理论基石, 对隐喻现象进行符号学重释, 系统探讨了隐喻的符号本质、生成机制及其在儿童道德认知建构中的动态作用。研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维度构建了隐喻的分析框架: 静态维度聚焦于词汇层面的符号相似性与句法层面的符号象似性, 揭示了隐喻生成的语言结构基础; 动态维度则通过寓言故事的实证分析, 考察了儿童在意义解读中如何主动构建道德隐喻, 并展现其道德判断的多元性与主体性。基于理论阐释与实证发现, 本研究为国际中文教育领域借助隐喻资源培育儿童的道德思维及判断能力, 提出了兼具学理性与可操作性的教育建议。

关键词: 语言符号学; 隐喻生成机制; 道德隐喻

作者简介: 孙荣, 广州新华学院讲师、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中文教育, 语言与文化。电邮: nancysun2012@163.com。刘清源 (通讯作者), 助教, 广州新华学院, 研究方向: 语言与文化, 东亚儒学, 教育学。电邮: qingyuanlovely@qq.com。孙澳, 东莞实验中学教师, 研究方向: 语文教育。电邮: 964190154@qq.com。

Title: A Study on Children's Moral Metaph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Semiotics

Abstract: This study is grounded in Saussure's linguistic semiotics, offering a semiotic re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symbolic nature of metaphor, its generative mechanisms, and its dynamic role in children's moral cognitive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rom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dimensions. The static dimension focuses on symbolic similarity at the lexical level and symbolic iconicity at the

syntactic level, uncovering the linguistic-structural foundation of metaphor generation. The dynamic dimension,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bles, investigates how children actively construct moral metaphors during meaning interpretation, demonstrating the pluralit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ir moral judgments. Based on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empirical findings,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for utilizing metaphorical 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o cultivate children's moral thinking and judgment abilities.

Keywords: linguistic semiotics; metaphor generation mechanism; moral metaphor

Author Biographies: Sun Rong, Lecturer,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and Ed.D. candidate, Guangzhou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E-mail: nancysun2012@163.com. Liu Qingyuan (Corresponding Author), Lecturer, Guangzhou Xin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Language and Culture, East Asian Confucianism, Education. E-mail: qingyuanlovely@qq.com. Sun Ao, Chinese Teacher, Dongguan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Research interest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E-mail: 964190154@qq.com.

一、引言

隐喻,作为一种古老而深邃的语言与思维现象,始终贯穿于人类认知与表达的历史长河。其英文词源“metaphor”源自希腊语“metaphora”,本义即“由此及彼”,形象地揭示了隐喻的核心机制:以一个认知域(始源域)的经验来理解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的经验,通过跨域映射实现意义的创造与传递(Lakoff & Johnson, 2003)。自亚里士多德(2003)将其界定为将属于彼事物的名称用于此事物,并建立起经典的类比公式(A is to B as X to Y)以来,隐喻研究便从修辞学的沃土中萌芽。在中国,早在《诗经》的“赋、比、兴”体系中,“比”作为比喻的核心手法,已蕴含着丰富的隐喻实践,成为中华诗性智慧的重要表征。

纵观学术史,隐喻研究的范式历经多次转向。从古典修辞学对辞格本身的分类与赏析,到哲学层面对隐喻与真理、存在关系的思辨,再到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的勃兴,将隐喻提升至人类基本思维方式的高度。费尔迪南·德·索绪尔(Saussure, 1980)开创的语言符号学,为隐喻研究提供了另一套极具洞察力的方法论工具。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个由能指(音响形象)与所指(概念)构成的符号系统,强调符号的任意性、系统性以及意义产生于系统内部要素的差异与关系之中。这一视角促使我们思考:隐喻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关系?隐喻意义的生成,是否可视作符号所指在特定语境下的层级性延伸与创造性建构?将隐喻置于符号系统的网络中进行考察,有望更清晰地揭示其从静态语言资源转化为动态认知工具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旨在融合语言符号学的理论视野与儿童道德发展的现实关切,尝试对以下核心问题进行探索:1)如何从语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出发,重新阐释隐喻的本质及其与一般符号的关系?2)隐喻的生成具有怎样的静态语言机制和动态建构过程?3)在儿童接触和理解富含隐喻的文本(特别是寓言故事)时,如何基于符号互动建构其道德认知?这种建构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深化隐喻的符号学理论,也能为儿童道德教育,尤其是国际中文教育中利用语言材料进行价值引导,提供科学的参考路径。

二、道德隐喻的研究现状

自亚里士多德将隐喻纳入修辞学范畴以来，隐喻研究历经了从古典辞格分析到现代认知科学探索的深刻范式转型。这一转型的标志性成果，当属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2003）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了“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本体隐喻”三种基本类型，并以“映射论”解释其工作机制，即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系统性投射。韩礼德（Halliday, 2000）的“语法隐喻理论”将隐喻研究扩展到词汇语法层面，关注同一意义在不同语法形式间的隐喻式体现，丰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义观。吉勒·福科尼耶（Gilles Fauconnier, 1994）的“概念合成理论”则引入了“心理空间”的概念，认为隐喻意义的产生是多个心理空间选择性整合的结果，更具动态解释力。尽管这些理论从认知和功能视角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隐喻的理解，推动了研究范式的多元繁荣，但仍存在一定的视角局限：传统修辞学研究多囿于词汇层面的替代与静态分类，对句子及篇章层面的动态意义生成关注不足；而主流认知理论虽揭示了概念映射的普遍性与系统性，但对映射在具体语言符号层面如何精确实现，以及个体在隐喻生成与解读中表现出的主体性和差异性，尚未给予充分的理论阐释。

在国内学界，隐喻研究同样呈现出引进与本土创新相结合的特点。一方面，学者们对西方理论进行了深入引介与评述；另一方面，也着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与语言中的隐喻智慧。近年来，曾毅平、李春红（2023）则通过语料库方法实证考察了汉语喻体的语法占位规律。具体到道德隐喻与儿童教育的研究领域，哲学与教育学研究者探讨了隐喻在道德概念形成和道德教育中的独特价值。例如，李宏翰、许闯（2012）明确提出“道德隐喻”的研究范畴，指出道德概念常通过隐喻得以理解和表达。邓达、易连云（2007）认为故事中个体或群体的思想、言行进行事实描述和情感表达，能够考察儿童对其中蕴含的道德原则、价值标准进行生活层面的理解。

然而，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尽管研究视角多元，但从严密的语言符号学体系出发，对道德隐喻的生成机制及其在儿童认知中的建构过程进行系统阐释的研究仍较为鲜见。多数研究或侧重于隐喻的认知心理效果，或侧重于教育文本的内容分析，未能充分剖析其从语言符号到道德意义的转化密码。尤其在国际中文教育语境下，如何利用汉语符号系统的特性，通过隐喻教学促进学习者的道德认知发展，更是一个亟待开垦的交叉领域。本研究试图在此薄弱环节有所突破，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基本原理作为核心分析工具，为道德隐喻研究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三、语言符号学研究视角的合理性阐释

（一）语言符号学概述

语言符号学，是用符号学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让语言学跟符号学有了科学的联结，他认为符号学是心理学的一部分，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他建立了经典的二元对立范畴：“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其中，“能指”指音响形象，“所指”指概念，两者的联结在根本上是任意的，但一旦在社会共同体中约定俗成，便具有强制性。

这种系统关系视角对于隐喻研究极具启发性。隐喻的理解和生成，恰恰依赖于在符号系统的网络中发现并建立新的关系连接。一个词项的隐喻义，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其固有意义（作为系统中的一个节点）在特定语境下，与其他符号节点（包括文本内外的符号）发生创造性关联的结果。索绪尔关于符号“不变性”（社会规约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历史演变的可能性）的辩证论述，也为解释隐喻意义如何从个人创新最终可能固化为语言常规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 隐喻与符号的关系

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二元结构出发，我们可以对隐喻进行一种清晰的符号学定位。在日常的、规约化的语言使用中，一个语言符号的“所指”通常是其第一层级的概念意义，即词典中收录的基本义或指称义。然而，在隐喻的使用中，符号的“所指”发生了创造性的滑动与扩展，进入了第二乃至更高的层级，具有开放性、多层级性、模糊性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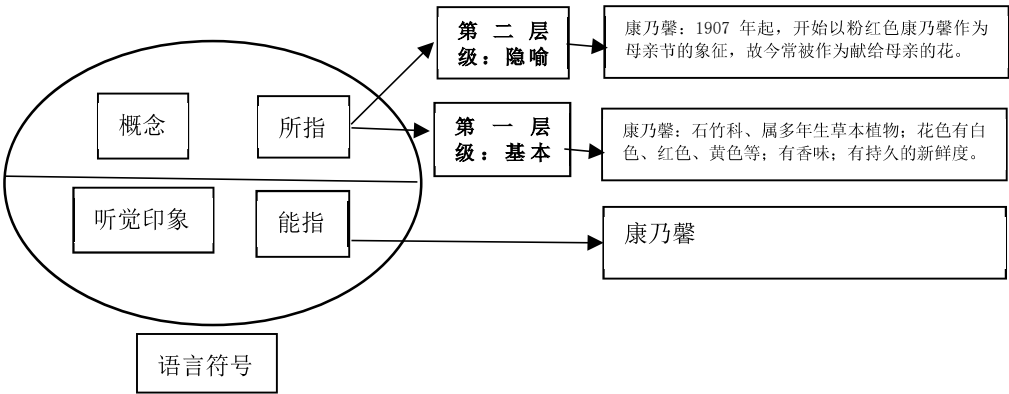


图 1：语言符号的层级性
Figure 1: The Hierarchy of Language Symbols

如图 1 所示，以“康乃馨”为例。其作为能指的声音形象或书写形式是固定的。在第一层级，其所指是作为植物的客观特征集合。而在第二层级，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实践（如美国母亲节的习俗传入），其被赋予了“母爱”、“感恩”等强烈的文化情感意义。当我们在母亲节引导儿童制作康乃馨手工时，我们所调动和强化的，正是这个第二层级的隐喻所指。这个过程生动展示了符号如何超越其直接指称，承载并传递道德情感价值。

在科技领域，术语的创造大量利用了这种符号的隐喻性延伸机制。如“电脑”、“鼠标”、“病毒”、“防火墙”、“云存储”、“QQ 医生”、“电子词典”等，无一不是借用日常概念的能指，通过隐喻映射，将熟悉领域的特征投射到陌生的科技领域，从而创造新的专业所指。这充分证明了隐喻是推动符号系统扩展、新意义生成的内在动力之一。

(三) 隐喻与符号的建构

隐喻的意义并非完全客观地存在于符号之中，而是在使用与理解的交际过程中被动态建构的。这一过程可以模型化为一个主体间的符号互动循环（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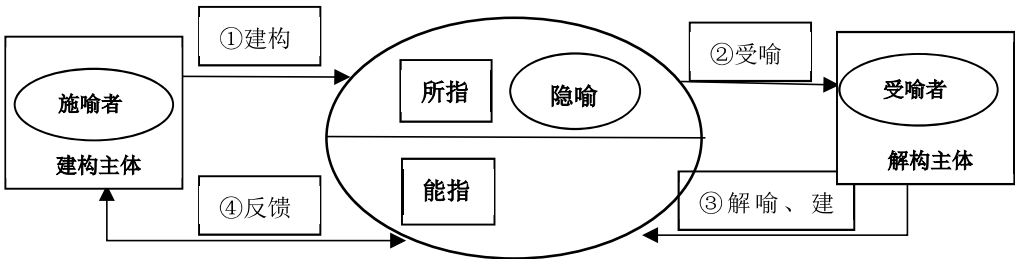


图 2：隐喻意义的主体间建构循环模型
Figure 2: The inter-subjective construction and circulation model of metaphorical meaning

首先,建构主体(施喻者)基于自身的认知、意图和文化背景,从语言符号系统中选择符号,并赋予其包含隐喻维度的所指(第①步)。这个符号(能指)被传递给受喻者(第②步)。受喻者作为解构主体,并非被动接收,而是主动调动自身的知识体系、生活经验和认知框架,对符号进行解码,尝试重建其意义,其中就包括对隐喻可能的解读(第③步)。这一解读结果可能通过言语或非言语方式反馈给施喻者,从而引发进一步的确认、澄清或协商(第④步)。这个过程在交际中不断循环,隐喻意义得以在主体间生成、调整和确立。

寓言故事作为复杂的符号文本,是观察这一建构过程的绝佳场域。一个寓言故事的文字层面(能指序列)提供的只是一个基础的情节框架(第一层级所指)。其深刻的道德寓意(第二层级隐喻所指)需要儿童作为积极的“解构主体”去发掘和建构。研究表明,儿童并非简单地接受成人预设的“标准答案”,而是会基于不同的主体定位(代入故事中哪个角色)、生活经验和情感偏好,生成多样化的、甚至出人意料的道德解读。这正体现了隐喻理解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也是道德认知个体差异在语言符号层面的反映。

让·皮亚杰(Jean Piaget, 2015)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是在“同化”与“顺应”的平衡过程中实现的。面对富含隐喻的寓言,儿童试图用已有图式去理解故事(同化),当标准解读与自身体验冲突时,则可能调整图式,产生新的理解(顺应)。语言符号的隐喻开放性,恰恰为这种认知冲突和平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空间,从而促进道德判断结构的进化。

四、隐喻生成的静态与动态双重机制

(一) 静态机制:语言系统内的意义潜势

隐喻的生成首先根植于语言符号系统本身所提供的静态潜势。这种潜势主要体现在词汇和句法两个层面。

1. 词汇层面:符号间的相似性

隐喻在词汇层面的生成,直接依赖于本体与喻体符号之间被感知到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隐喻得以建立的认知基石。根据相似性的性质,可大致分为两类:

例如:

①人体部位-事物:山头-山脚、头儿(领导)、头等;左右手、情同手足

②颜色:红色-喜庆-春节、黄色-尊贵-皇权、白色-悲痛-葬礼

物理特征相似性,基于事物之间外在形态、功能等可感知属性的相似。例如,基于空间位置相似性的“山头”、“山脚”;基于形状或功能头部重要性相似的“头儿”(领导)、“头等”;基于手足协作关系的“左右手”(得力助手)、“情同手足”。

抽象/文化规约相似性,基于社会文化赋予某种特征的象征意义或心理联想。颜色隐喻是典型代表,如“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与“喜庆”(春节)、“革命”(鲜血)关联;“黄色”曾与“尊贵”(皇权)相连;“白色”与“悲痛”(葬礼)相通。这些关联并非天然,而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构成了语言符号系统中稳定的隐喻资源库。

2. 句法层面:符号的象似性

索绪尔强调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的任意性,但当代符号学,深受皮尔斯影响,同样关注“象似性”,即符号形式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理据性关联。在句法层面,象似性为隐喻的生成和解读提供了

结构动力。象似符又分 3 小类：映象符、拟象符、隐喻符。根据这些研究，本研究基于国际中文教学，提出了隐喻生成的静态机制，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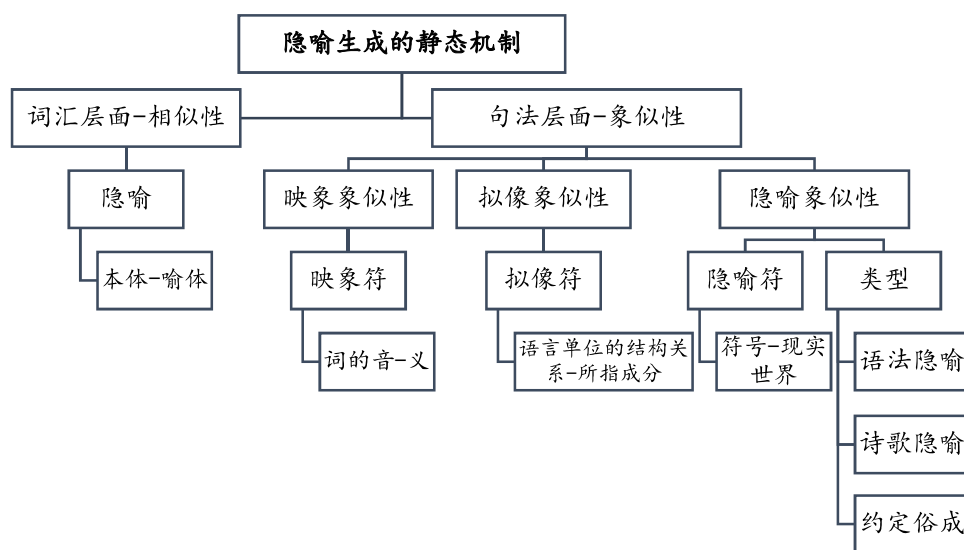


图 3：隐喻生成的静态机制

Figure 3: Static Mechanism of Metaphor Generation

认知语言学派的罗纳德·兰卡赫尔（Ronald Langacker, 1987）提出“基体”与“凸体”理论，认为语言表达是对认知域中某一特定部分的“凸现”。每个符号建构主体处于不同观察视角，对同一语言符号有不同的识别、选择、解码、加工方式，语言符号使用者会选取某一凸显的外在特征或内在属性上的相似性，并将这种相似性扩大化和具体化。如下面的例句，“月亮”用作始源域时，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读。

例如：

- ①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 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苏轼《水调歌头》）
- ③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

三首诗词里“明亮”、“圆”、“月出”是月的不同的概念凸显，赋予了不同的隐喻义，让读者深入体会到作者此时此刻的心境与情感。

句法层面，隐喻化思维的形成是隐喻构建的重要环节。符号使用者对本体与喻体间相似性进行“识别—选择—解码—加工—理解—输出—再造—反馈—认知—内化”的过程就是隐喻化思维形成的过程。始源域与目标域间的关系是“差异中的相似”（束定芳，2004）。

例如：

- ④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 ⑤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

在例句④中，将“春风”置于主语位置，将“剪刀”置于喻体位置，并用“似”连接，这种“X 似 Y”的句法构式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隐喻生成框架，强制读者在“春风”与“剪刀”之间寻找功能上的相似性（裁出细叶），从而完成诗意的创造。例句⑤中，把“梅花”、“雪”进行了拟人，赋予人的意识进行比较，突出了“梅花”的香气与“雪”的洁白。

（二）动态建构机制：主体在语境中的意义创造

静态机制提供了隐喻生成的可能性，而动态建构则描述了隐喻在具体交际和认知活动中如何实现。这是一个以主体为核心、语境为依托的创造性过程。

1. 主体考察

隐喻的建构与解读高度依赖主体因素。主体因素有共性因素和个性因素，共性因素是符号使用者之间达成的共识，往往受到文化底蕴影响，以保障施喻者与受喻者之间的交际行为顺利进行；由于社会经历、世界知识、生活环境、思维方式、文学修养、情感等不同，符号使用者又会表现出个性因素。钱钟书的“两柄多边”理论精妙地概括了这一点，“两柄”指同一事物可因情感态度的褒贬不同而形成相反的喻义（如“水”可喻“柔情”亦可喻“祸患”）；“多边”指同一事物具有多种属性，隐喻时可能只取其一端（如“月”可取其“圆”喻团圆，取其“明”喻皎洁，取其“缺”喻遗憾），其观点蕴含博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是对英美以认知为导向和驱动的概念隐喻理论的有力补充（孙毅、唐萍，2023）。

在儿童道德隐喻理解中，个性因素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生活经历、情感偏好、既有道德观念（个性因素）以及所处文化社群的共同规范（共性因素），共同影响着其解读路径。例如，在《龟兔赛跑》的故事中，一个性格好胜、看重结果的儿童，可能更倾向于对兔子因骄傲而失败感到惋惜（凸显“谨慎”属性）；而一个性格坚韧、相信努力的儿童，则可能更钦佩乌龟的坚持（凸显“毅力”属性）。这种基于不同“边”的选择和带有不同情感“柄”的判断，直接构成了儿童多元道德立场的语言表达。

2. 基于寓言故事的道德隐喻建构

为具体揭示儿童如何动态建构道德隐喻，本研究选取经典寓言《龟兔赛跑》为材料，依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研制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进行语言改编。改编中控制词汇量、词汇复现率及难度，充分考虑个性与共性因素，区域国别文化词汇（戴玮玮，2025，p.309），同时重视口语表达，角色间对话丰富生动，喻义注重塑造儿童道德价值观。此外，通过创设真实语境、推动读写融通、引入多元文本等方式激发学生主体性（周建强，2025，p.321）。在改编案例寓言故事《龟兔赛跑》，控制词汇难度及故事长度（共 144 个字），注重难点词汇复现率（“兔子”6 次、“乌龟”9 次，“跑”5 次，“慢”3 次，“比”2 次）。

教学改编材料：

龟兔赛跑

兔子和乌龟是邻居。

兔子：乌龟你跑步太慢！我跑得最快。

乌龟：我们比比吧！

第二天，他们比赛跑步。

兔子一会儿就跑了很远，乌龟慢慢爬。

兔子：乌龟太慢了，我先睡一会，然后再跑。

乌龟没有睡觉，一直爬，爬呀爬呀。

当兔子醒来时，乌龟快要到终点了。

最后乌龟是第一名。

乌龟：啊，我是第一名！

兔子：哇……（哭了）

随后对 42 名 8 岁儿童（来自国际学校，具备基本中文理解能力）进行故事讲述与开放式访谈，引导他们分享对故事的理解和看法，而不预先给出任何道德结论。儿童的反馈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见表 1）。我们将其解读按“主体定位”（代入谁的角度）、“道德判断”（是否公正等）、“情感色彩”（赞同/反对/中立）和“凸显属性”（关注哪个道德维度）四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

序号	主体定位	频次	儿童的隐喻理解	道德判断	“两柄”情感色彩	“多边”凸显属性
1	乌龟	10	乌龟第一名，是意外。	非公正	反对	偶然性
2			我们是乌龟，我们要努力跑。	公正	赞同	努力
3			乌龟太累了。	非公正	中立	努力
4	兔子	20	兔子不要睡觉，就第一名。	非公正	反对	告诫
5			兔子不哭，下次是最棒的。	非公正	反对	鼓励
6			乌龟太丑了，我喜欢兔子。	中立	赞同	个人情感
7			不要说别人(跑得慢)，不好。	非公正	反对	交际
8	旁观者	12	下次比游泳，乌龟第一名。	公正	中立	公正
9			为什么不叫醒兔子？比赛不公平	非公正	反对	公正
10			他们不是好邻居。	非公正	反对	交际
11			下次，乌龟和兔子一起跑步，一起运动。	公正	中立	合作

表 1：隐喻性蕴含图谱统计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etaphorical Inference Patterns

研究发现，第一，儿童主体定位多元化，儿童并不天然认同“主角视角”（乌龟），而是自由代入乌龟、兔子甚至旁观者角色，从不同立场出发构建意义。第二，道德判断个性化，仅有约 59.5% 的儿童认同“努力就有回报”的传统公正判断，相当一部分儿童从“运气”、“规则公平”、“合作”甚至“个人情感”等维度做出“非公正”或“中立”判断，这反映了其道德认知的复杂性与初期的批判思维。第三，“两柄多边”鲜明体现为同一角色（如兔子）既可能因“骄傲睡觉”被反对，也可能因“可爱”被喜爱；故事寓意既可凸显“努力”，也可凸显“公平”或“合作”；儿童的选择是其个人认知与情感倾向的投射。这一微观实证表明，寓言故事的道德隐喻意义绝非单一线性的传递，而是在儿童作为主动建构者的解读过程中，与文本符号互动、碰撞、合成的结果。教育者需要尊重并引导这种建构的多样性。

五、结语

本研究从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系统观和关系论出发，重新审视了隐喻的符号本质，将其界定为语言符号所指在特定语境下的创造性、层级性延伸。通过构建“静态-动态”双重分析机制，研究阐明了隐喻既植根于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似性与象似性潜势（静态），又实现在具体交际中主体基于认知与语境进行的主动建构（动态）。结合对儿童寓言理解的实证观察，研究进一步揭示，儿童道德隐喻的生成是一个高度主体化、多元化的符号建构过程，深受其主体定位、情感倾向和个人经验的影响。

研究对国际中文教育中的价值观培养，具有以下启示：首先，重视隐喻资源的系统性开发。教材编写与教学活动中，应有意识地选择和分析富含隐喻的语言材料，关注多层次的文化与道德隐喻义，引导儿童探索符号背后的意义世界。其次，尊重并引导多元意义建构。教师应创设开放、安全的讨论环境，鼓励儿童从不同角度解读文本，分享各自构建的隐喻意义，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同理心。再次，儿童促进符号认知与道德发展的协同，语言学习与道德教育可有机融合。最后，关注教育者的符号意识，在儿童意义建构的过程中提供适时、恰当的“支架”，促进其认知与道德的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大湾区区域文化助力 PYP 少儿国际中文教学》（项目编号：2023GD0010）的成果；广州新华学院 2025 年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2025KYQNSK04）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Sun Ro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6266-5628>

Liu Qingyuan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9473-9921>

Sun A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8-1806-1166>

References

- 戴玮玮 (2025): “基于《国际汉语教程》的澳门地区汉语教材本土化研究”, 《中文教育与评价学刊》(02): 309-320.
- [Dai Weiwei (2025). “A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xtbooks in Macau: Taking *A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02): 309-320.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11>
- 邓达、易连云 (2007): “个体道德叙事：儿童道德教育的可能方式”, 《学前教育研究》(01): 15-19.
- [Deng Da, Yi Lianyun (2007). “Individual Moral Narration: New Model in Children Moral Education.” *Studi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01): 15-19. DOI: <https://doi.org/10.13861/j.cnki.sece.2007.01.005>]
-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A.K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akoff, G & Johnson (2003). *M.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李宏翰、许闯（2012）：“道德隐喻：道德研究的隐喻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111-117。

[Li Honghan, Xu Chuang (2012). “Moral Metaphor: Research on Morality from Metaph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5): 111-117. DOI: <https://doi.org/10.16088/j.issn.1001-6597.2012.05.009>]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Ministry of Education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ooperation (2021).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Proficiency Standard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让·皮亚杰（2015）：《智慧心理学》，严和来，姜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iaget, Let (2015). *Psychology of Wisdom*, trans. Yan Helai, & Jiang Yu.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束定芳（2004）：“隐喻和换喻的差别与联系”，《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03）：26-34。

[Shu Dingfang (2004). “Metaphor and Metonymy: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03): 26-34.]

孙毅、唐萍（2023）：“钱钟书隐喻学术思想管锥”，《当代修辞学》（01）：51-62。

[Sun Yi, Tang Ping (2023). “A Probe into Qian Zhongshu’s Academic Thoughts on Metaphors.” *Contemporary Rhetoric* (01): 51-62. DOI: <https://doi.org/10.16027/j.cnki.cn31-2043/h.2023.01.008>]

索绪尔（1980）：《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

[Saussure (1980).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Gao Mingkai. Commercial Press.]

亚里士多德（2003）：《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ristotle (2003). *Rhetoric: Alexander’s Treatise on Poetry*, trans. Yan Yi, & Cui Yanqi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曾毅平、李春红（2023）：“喻体的语法载体与语法占位”，《当代修辞学》（03）：61-70。

[Zeng Yiping, Li Chunhong (2023). “The Syntactic Carriers and the Syntactic Positions of the Vehicles.” *Contemporary Rhetoric* (03): 61-70. DOI: <https://doi.org/10.16027/j.cnki.cn31-2043/h.2023.03.008>]

周建强（2025）：“国内双语学校国际中文课程的阅读教学实施探索”，《中文教育与评价学刊》（02）：321-328。

[Zhou Jianqiang (2025). “Exploration of Reading Instruction Implementation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Programs at Domestic Bilingual School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02): 321-328.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2.12>]